

小阿婶

叶龙虎

小阿婶属龙,与我刚好相差一轮,她与小叔结婚时才十八岁。对于他们的婚礼,我一丁点的记忆也没有,唯一的印象就是平时一到晚上就黑咕隆咚的堂前间,这一夜灯火通明,灶间热气腾腾,我奔进奔出发“人来疯”,被新大门的石门槛绊了一跤,下巴磕出一道口子,抹上从邻居家刨来“老虎骨”的粉末才止住血。这个疤痕至今还在。

小时候跟着小叔睡。躺在老式的木床上,小叔讲什么上八府下三府、桃花岛六横岛、八月十六大潮汐,听得我云里雾里。现在算来,当时我还不满5岁,因为他们结婚以后,我再没跟着小叔睡过。

听大人说,小阿婶的娘家很苦,她很小就失去父亲,是在牛背上长大的。因为没有文化,又有一点木讷,在生产队干活时常常要被人嘲弄。她并不生气,只是默默地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力气,来完成手中的活计。虽然她干不了细活,却是什活都敢干,耕田、耙田、撑船等男人干的活,她也照干不误。小叔虽没读过书,但他勤劳、聪明,摇草绳、卖瓜秧、撑船搞运输、开年糕店、开油作坊,当时农村能挣钱的行当,他几乎都干过。家里的那些农活,自然只能以小阿婶为主了。

小阿婶生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,她对孩子们很放任,从不管他们干啥,三四岁就在田里玩耍了,拾稻穗、挖泥鳅,每天弄得“泥洞拔出”一样。因此,孩子们从小就很独立。我的大堂弟,13岁就跟他父亲撑船了,不满15岁开始单独搞运输,机船开得极快。有一年台风,水库泄洪,停泊在闸口的运输船被突然而来的洪水冲了个底朝天,正在船上的兄弟俩都被冲到了船底下。江面雨大风急浪高,岸上虽然有人看见,但也不敢轻易下水施救,都说这下惨了,某某的两个儿子都没

了。谁知过了一会,江面上冒出来两个脑袋。等小阿婶冒着大雨,嚎哭着奔到江边,他们已经把沉到江底的棉被、锅子、镬铲、脸盆甚至老花镜都捞了上来。

小阿婶家当时是周围村子唯一一家经营瓜秧的农户。我的房间与小阿婶的房间只隔一堵板壁,那些年里,我的睡梦大多是被小阿婶打破的。每天早晨三四点钟光景,就会响起“惠英,爬起”的咋呼声,五更天是十五六岁孩子正要睡觉的时光,惠英应了一声后又睡着了,往往这样的声音要重复好几遍,直到我们都被叫醒。惠英是我的堂妹,她从小肯吃苦,被母亲唤醒后就匆匆起来,洗把脸,挑起头夜装好的秧担出门了,而这个时候,还是满天的星星。这样的情景是赶早市,惠英必须在天亮之前赶到七八里外甚至十几里外的集市设摊卖秧苗。下午是小叔和惠英出门走村穿户“打乡”的时候。在春风吹动杨柳的季节里,常常看到他们父女挑着秧担,秧担上放着一块块做得薄薄的、方方的泥板,泥板上布满了张着两瓣小嘴唇、十分嫩绿可爱的瓜秧,仿佛是列队整齐的士兵排成的一个个方队。这个时候,小阿婶就带着两个儿子在家做泥板、插瓜子。

我的两个女儿小时候少不了要麻烦小阿婶。那时候我在外面工作,妻要下田时常常把女儿在小阿婶家一丢,小阿婶不管多忙,都会认真照看。

小阿婶是农村中千万个勤劳、厚道的妇女中的一个。她们这一代人,一辈子任劳任怨,为生计、为儿女操劳。等到儿女们都成家了,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,早就透支空了的身体又开始疾病缠身。小阿婶去世时还不满七十岁。含泪向小阿婶的遗体告别时,恍惚间,眼前浮现的还是她忙忙碌碌的身影。

么急,包子是热的,赶紧趁热吃,里面还有根玉米,上班饿了好当点心。”我接过袋子,正不知该说些什么,他瘦削的背影已经淹没在雨帘中,我喊道:您怎么也不打伞啊,开车慢点。岳父没有回头,只是背身挥了挥手,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,我还在那里,捧着温热的早饭。原来,有一种背影叫做关爱。

三年前,岳父在邻居的影响下喜欢上了二胡,爱好归爱好,毕竟底子薄,学起来分外吃力。但岳父来了劲,买了教材,调弦、定调、拉弓、指法,样样从头学起,大半年过去,终于会拉了首《东方红》。岳父一下子乐开了花,跑去花鸟市场买了株小香椿,每天晚饭后拉一段二胡浇一会儿树,好不快活。一年后的重阳黄昏,岳父摆好架势,头微微扬起,双目半闭,熟练地拉奏了一曲《涛声依旧》。我站在背后不由拍手叫好,他好像没听见,夕阳照得他头发一圈亮,身影却是一片黑,像是轮廓剪纸,旁边瘦瘦的香椿已经长出了茂盛的叶子。原来,有一种背影叫做热爱。

岳父的背影中总有薪火相传的东西让我感动,不知何时起,仰望岳父的背影已经成了我的习惯。

在与岳父相处中,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背影。

岳父已经在宁波港工作了35个年头,早可退居后方的他仍然活跃在生产的最前线,每次加班加点总少不了他匆忙的背影。面对岳母的怨言,岳父总是笑着回应:“不懂了吧,这叫爱岗敬业,老有所为!”几个月前,岳父的单位迎来了宁波港口最大规模的汽车滚装出口,岳父坚持要去通宵奋战,岳母忧其劳累死活不肯,妻子也在旁不住劝说。岳父沉默了,搬起一把凳子静静地背坐在门口低头不语,岳母的抱怨声越来越大,岳父只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。良久,他起身掐灭了烟头,拿上水杯往外走去,跨过门槛时蓦地停步,随即一声叹息:“马上退休了,你们就当发挥最后的余热吧!”原来,有一种背影叫做钟爱。

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公司文化新闻中心学习,其实也就十几分钟的公交路程,可岳父还是执意每天起早开车送我,这让我很过意不去。那天下了大雨,熬夜看球的我不免起床有些拖沓,因为担心迟到,也没道个别就匆匆下了车。还没跨进大门,就看见岳父顶着雨追上来,递上一个白色袋子:“走得那

背影

伍晨卉



守门人

岑玲飞

整理抽屉时,看到一张20多年前的毕业照,照片上有一人,是学校的守门人。

不知是谁先这样叫的,他便被我们叫成公公了。公公快七十岁了,可一点也看不出来。公公的丑是丑到家了,他的肚子有葫芦那么圆,脸却不胖,尖尖的下巴和脑额,小小的三角眼,个子奇矮。他的脸整日红红的,一定是爱喝酒的缘故吧。他喝酒不讲时间,想喝就喝。同学们从教室到寝室的路上碰到他总会喊他公公,公公听了一边笑一边点头,一边答应一边回叫你的名字,又忙又不可开交的样子。

公公每天早晨给学校的办公室送开水,他拎热水瓶时背看上去就驼了,他一趟竟能拎六七只加满开水的热水瓶,而且跨楼梯时一步跨两格。以前我总是担心他会走不动,可他每次都不怎么轻松又一步不停地坚持从食堂拎到办公室,也许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了。

在学校还没买锅炉时,全校的开水都是公公一个人用煤饼炉烧的。公公每天起得最早,冬天在我们起床前就弄好了热水,夏天也一样,所以公公的脸很红并不全是喝酒的原因,更可能是煤饼炉烤的。

公公还每天送报纸和信,每当下午3点,同学们不等公公送来自己就找上门去。公公最讨厌一大群人同时翻找自己的信,他非要亲手归类,交到班长手中才放心。虽然这样,信还是没经过班长之手就被同学们拿到了。有时候,哪个同学一连几天没有信,便去找公公算账,对公公委屈地说:“一定是你把我的信扣了起来。”然后不由分说闯进他的小屋子里“哗”一下掀开床单——公公爱把信藏在床单底下。这时公公总是十分诚恳地说:“没有,我真的没有,我扣你的信有什么用!”

公公的小屋子很小很小,除了吃饭的桌子还有一张床和一台黑白电视机,电视机屏幕小得像语文书的封面,只能收到慈溪电视台的点歌台。每逢周末,总有一些人不回家,不回家的同学们吃过晚饭后一定要在公公的小屋子里聚会。十几岁的女生们与一个近七十岁的老人聊得很热闹,大谈人生、人际关系、将来……谈到后来,总是只剩下公公还在谈,我们静静地听着,比听老师讲课还认真,公公的话确有一番道理。有时他爱自夸,说自己识字,还会写字,说以前的学生与他成了朋友,现在还来看他。一张椅子坐两个人,椅子都坐满了,同学们便坐到床沿上,一边床沿能坐十来个人。看电视是必不可少的,慈溪电视台的点歌台开始了,不知不觉十几个人都跟着电视唱:天地悠悠,过客匆匆,潮起又潮落……只有公公一个人不会唱,也看不清屏幕的字。

拍毕业照的时候,班长把公公也叫来了,当我拿到洗出来的毕业照,看见公公比两边的老师明显矮了一大截,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一脸严肃,唯有公公一个人张大嘴,眯着眼乐不可支地笑着。

三江月

总第5666期

投稿邮箱:

essay@cmb.com.cn



永鸣益吞世界

益往直前

74

苏联解体后,俄罗斯一度陷入极度的困难中,这种体制的巨变,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影响是深层的,甚至影响到这个民族的一些优良传统。后来,经历了叶利钦时期以“休克疗法”为标志的激进改革,在私有化进程中,社会出现各种无序的状态,为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。掌握着权力和资源的官僚们,利用各种机会,大肆贪污腐败、敲诈勒索、中饱私囊。在俄罗斯,带有黑社会色彩的执法行为相当普遍。

2000年初访普京那次,在莫斯科接二连三的遭遇,使我深刻领教到俄罗斯官僚们滥用职权敲诈勒索的丑态。

临行前,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首席记者路彪特意嘱咐我,一定要向俄罗斯使馆要一封总统府出具的邀请信,这样过海关时会方便很多,否则可能会遇到大麻烦。那时候,中国人去俄罗斯,几乎都会遇到盘查、克扣和刁难。

下飞机到了海关通道,同机的俄罗斯人鱼贯而出,我们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一块儿排队办手续,出示护照,查验签证。我们报道组设备多、行李多,排在队伍最后面。在排队期间,我也在慢慢观察,那些俄罗斯海关边检的官员,眼神都很不友善,仿佛每个中国人都是来俄罗斯偷东西一样,说话也爱理不理的。

排了20多分钟,一个胖胖的穿海关制服的中年妇女冲我们走过来,粗声粗气地示意:“你们的护照!”我们把护照递给她,她随意翻看了一下,让我们在旁边等着,拿着护照就进了办公室,一晃一个多钟头不见人影。

我们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来接我们的记者站和大使馆的人都在外面进不来,我们都不会说俄语,只能被干晾在那儿,拖了两个多钟头。

后来,我实在忍不住了,就跑去岗亭敲玻璃。里面一个穿制服的男人猛地站起来,瞪着我说:“你干什么?”我用英文连比划带解释,说我们的护照被拿走了,没人理我们。没想到那人显得非常愤怒,比划着说:“你要再这样的话,就把你抓起来!”

怎么说我也算是经历过风浪的,相信他也不至于

会真把我铐起来,但是多少被他的举动惊到了,一个海关工作人员怎么能这样粗暴?但是护照要紧,我还是坚持比划着沟通。10分钟后,那个中年妇女终于出现了,手里拿着我们的护照。

我满腔怒火,从文件夹里把那封邀请信拿出来,说:“你看看这个,这是你们俄罗斯总统府的邀请信,我来采访你们的总统普京,你凭什么把我们晾在这儿两个多钟头?”

那中年妇女装傻,比划着说:“这跟我没什么关系,护照我们检查完了,你们排队吧。”实际上,那时离我们下飞机已经快三个小时了,整个厅里的人都走光了,只剩下我们几个,已经不用排队了。

我当时真是觉得很委屈,出来后,路彪跟我说:“那女人来查护照时,你直接给她塞上50美元,啥事没有了。”

我气还没顺过来:“我凭什么给她钱啊?”路彪说:“这是俄罗斯的生存法则,她拖你那么长时间,就是在等你找她给钱呢。”

我这才醒悟过来,当时压根儿没往这上面想,就算想到了,看她那态度,也不愿给她钱。